

城市空间的“新天地”缺少什么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包亚明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第三世界立场，必须具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从“新天地”到“新天地系列”

今天引人注意的是，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无地方性”空间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正发生在第三世界，这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的语境。从历史角度看，最迅猛的都市化过程是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但如今的都市问题已经超越了西方文明或资本主义的分析范畴。从城市增长的平均率和居民增加的绝对数字两方面来看，当代第三世界的都市化已经很轻易地超过了 19 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的增长。更何况如今的世界已经如此相互关联，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躲避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所带来的巨大震惊。

“新天地”项目在中国大范围内的扩张复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西方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有力例证。不断扩张复制的“无地方性”的“新天地”项目，通过对上海、杭州、重庆、武汉等地方空间的消费主义式改造，创造了令人目眩的融时尚、商业于一体的全球化景观，这一“无地方性”空间的生产模式的确立和复制，已经促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空间消费文化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和繁殖。消费主义的空间使用逻辑在巧妙地利用地方性元素的同时，正在瓦解和颠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并有力地推动了精英阶层的消费文化观念，以及对于空间生产的控制。

上海的“新天地”动工于 1999 年，是一个经过好莱坞式改造的“石库门”街区的休闲娱乐城，“石库门”在此已不再是最具上海特征的生存空间，而只是一个有着石库门外壳的梦剧场式的“景观”。在“新天地”的美国设计师本杰明·伍德看来，“新天地”不是展示厅或博物馆，而是一个商业性的空间。他试图创造另一个上海人不熟悉的历史，让石库门从私人化走向公众共享。本杰明·伍德的设计无疑属于后现代性质的拼贴，他除了在设计中保留了黑色门扇、扣环、窗、屋顶等很中国化的建筑要素外，同时也把玻璃等现代建筑要素融合进“新天地”的设计中，营造出一个据说是上海最有创造力、最有活力、最具娱乐性、最善于应变的环境。最终，“新天地”实质上就成了一个聚会的场所。按照本杰明·伍德的看法，“新天地”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是神圣的；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用于日常活动的场所，一个每天有几千人前来娱乐、购物、用餐、散步、参观、谈生意的地方。

继上海“新天地”之后，与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相邻，杭州市在西湖边打造了“西湖天地”。“西湖天地”也是由美国设计师本杰明·伍德操刀的，同样使用了后现代的拼贴手法，把白墙黛瓦、檐角雕花、九曲长廊和大块面的玻璃，拼贴成面向西湖的新旧混搭的空间组团。重庆市化龙桥片区旧城改造项目“重庆天地”也已开工建设。与上海“新天地”一样，未来的“重庆天地”也有一个人工湖，也有包括购物中心、星级酒店、高级写字楼在内的中心商贸区，也有国际风格的商品住宅区，在最先动工的具有重庆山地特色的西大门住宅区中，也有一个红色建筑物——红岩革命纪念馆，建成后的“重庆天地”不仅要成为城市未来的标志，也是外籍人士最常出入的地方，更成为年轻人时尚娱乐最前卫的地方。继重庆新天地之后的是武汉“新天地”的建设项目。至此，一个布局全国的“新天地系列”已渐成格局。

城市空间的改造与原住民的遗失“新天地系列”的扩张复制速度，其实远远低于期望旧城区改天换地的人们要求。作为休闲目的地与消费胜地的“新天地系列”的引人入胜之处，并不在

于其纯正的血统，相反倒是它的人造特征。依靠自然环境、交通条件、房地产和消费服务业，“新天地系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完美的都市梦境。人们在普遍认同“新天地”神话的同时，都坚信人造特征一定具有可复制性，于是“新天地”就成了大批中国城市迈向国际化征程中令人鼓舞的奋斗目标。

无论是上海的“新天地”，还是“重庆天地”，都是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项目，新城市空间的生产种新消费氛围的营造，都是以久居于此的人们的怅然离去作为先决条件的。人们在感叹各色各样的“新天地”使城市面貌越来越赏心悦目的同时，也许不会留意到都市空间的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居住空间和消费环境的变化，这种改变同时也带走了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旧城区的日渐消逝，以及旧区生活形态的日益凋零。旧城区承载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一条条街道，它还承载着人们对于熟悉的街区的热情、伤感和缅怀。

因此，如何在国际资本与行政力量的牵制中保存城市空间的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生活传统，如何积极地保护自发性的城市生活形态，其实是生活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的人们共同面临的难题。

城市空间的改造无疑是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前行的。城市建筑文化与现实利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往往因为政府行为的介入而更趋复杂。而由开发商主导的城市空间的急速变迁，不仅抹平了这个空间的所有生活印痕，而且也彻底抛离了与这个空间休戚相关的人群。城市空间中的原住民已经被迫置身事外，他们的感受已经无足轻重。城市空间已经完全由别样的人们来操控，他们往往只关注空间的经济价值，就算珍视传统，也是因为传统可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这种城市改造过程，更多地只看到了物，而忽略了人，更多地注重到了“景观”，而忽略了人文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造同时还遗失了原住民这一群体，其实，原住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他们是城市形象的真实载体。

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中国问题

问题的核心不在精英阶层成功地伸张了他们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而在于精英阶层对空间的需求很少被质疑或拒绝，中国的城市正不断地因应这批新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召“新天地系列”的扩张复制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了控制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城市发展重要的建构性力量的文化，已经完全蜕变为纯粹的消费文化。

不平衡增长与不平等是第三世界都市化的显著特征，而都市研究则提醒我们：第三世界必须重视这一特征带来的过度都市化的负面效应，因为这一特征往往会打通快速都市化与经济、社会停滞的联系信道。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不发达”与“过于发达”往往是共存的，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第三世界立场，必须具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便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内部，中心城区的发展与其郊区的城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在发展规模与发展模式等方面，而且也同样反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表达方式上。因此，正如大卫·史密斯所说，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和图表看似毫无生气，但实际上却隐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们生存和奋斗的故事。